

中古诗人

群体及其诗风演化

阮忠 著

ZHONGGU SHIREN
QUNTI JIQI SHIFENG
YANHUA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海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海南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中古诗人

阮
忠
著

群体及其诗风演化

ZHONGGU SHIREN
QUNTI JIQI SHIFENG
YANHUA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诗人群体及其诗风演化/阮忠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4.5

ISBN 7—5430—3036—5

I. 中… II. 阮… III. ①诗人—人物研究—中国—中古②
诗歌—作品风格—文学研究—中国—中古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8366 号

书 名:中古诗人群体及其诗风演化

著 者:阮 忠

责任编辑:李杏华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湖北省通山县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1.875 字 数:300 千字 插 页:5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2000 册

ISBN 7—5430—3036—5/I·425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引 言

我国历史上“中古”的界定,从已有的众多著述来看,目前没有一致的意见。通常以“中古”指汉魏六朝时期,起于汉魏,讫于南朝陈代的灭亡。而这里的“汉魏”又多指汉末建安时期。依此,“中古”前后约四百年时间。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的“中古”,就是从汉魏之际到南朝陈代的结束。和他意见相近的有王瑶,著《中古文学史论》;王锺陵,著《中国中古诗歌史》;詹福瑞,著《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不同的意见是,陆侃如在《中古文学系年·序例》中说:“中古本是个含糊的名词,我是指公元一至五、六世纪。因为我假定这是封建初期,也可以说是奴隶制与封建制递嬗的时期。”^①这里涉及到奴隶制与封建制划分的问题,姑且不论。所谓的一世纪到五、六世纪,在朝代上看,就是西汉末年(公元1年是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到南朝陈代灭国的589年。他这部书的时间跨度,上限为前53年,下限是340年。郭绍虞则在《中国文学批评

^① 陆侃如:《中国文学系年》,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史》里,把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时期,其中古指的是“自东汉建安至五代”。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其中古期指的是魏晋至明代中叶。还有人认为,“中古”应是西汉到南朝的灭亡,也有把中古的上限推至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多的说法实际上是对“中古”把握的尺度不一所致。在我看来,对中国历史的“中古”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中古”可以上溯到秦王朝的统一,那时候天下经历的数百年战乱平息,归于一统,建立了新的国家体制;下限可以延至明朝初年资本主义萌芽,新型的社会变革正在发生。狭义中古的上限则是东汉末年,一般说是汉末建安时期,社会从统一走向三国鼎立的大分裂。具体地说,宜在汉少帝昭宁元年、汉献帝永汉元年(189年,这时距建安元年还有6年)。这一年,董卓进入洛阳,以史称的“董卓之乱”开启了汉末建安时代。下限则在隋开皇九年,隋军攻入建康,陈亡,时为589年。本书的论述就是建立在后一时限之上的。

“中古”在历史与文学上都是一个魅力四射的时期,社会动荡,本为一统的汉王朝灭亡,继之而起的是天下三分,魏、蜀、吴鼎足而立,随后有西晋的重归一统;待东晋灭亡,南北分裂,重视文学的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前终后继,命浅祚短。思想学术上的玄学风潮与士人风度渐兴,从汉魏之际延伸到南朝消亡,与社会的波动并行;文学领域诗人文士可谓比肩接踵,诗与文生生不息。而且,这一时期的文人群体数以十计,彼沉此浮,弄政治,玩文

学,往往兼有政治和文学的双重性。对于中古诗歌而言,这里称诗人群体而不言诗歌流派,最主要的是诗人群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领袖人物以及可以指导这一群体从事创作的诗歌理论。诗人群体可以走向诗歌流派,却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不一定能够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这里从宽泛的意义上认识诗人群体,主要指同一历史时期有着共同生活、共同趣味或一度有着共同生活、共同趣味的诗人群,不在意他们是否演化为一个特定时期的诗歌流派,自然不排斥诗歌流派。不过,古代少有纯粹的诗人群体,一些诗人在创作上多不钟情于一体,为诗之时或为文、或为词、或为小说、戏曲等。中古诗人同时为文的甚多,为文之体与为文之用也不拘一格。

说诗人群体,理应从文人群体说起。春秋时期官学下移、私学兴盛是文人群体最原始的构成。韩愈的名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师生当是构成文人群体的基础。诸子百家之学各有师承,如孔门弟子、孟门弟子、墨门弟子、庄门弟子均有明载,由此产生了具有学派特征的文人群体。战国之际,百家争鸣,齐宣王集众学群贤于齐稷下,文人最为繁盛。“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①这就是齐宣王继承齐威王好士的传统,在齐国的都城临淄的稷门设置的稷下学官。齐宣王

① 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189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召集天下文人在学宫内讲学论道，一时间名士云集，各种学派杂处。这一段记载中没有提到孟子。《盐铁论·论儒》则说：“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期，孟子对杨朱、墨翟之学盈天下的批评，以表明自己是怎样愤而维护孔子的学说，无意中昭示了杨朱、墨翟学派在当时的巨大力量。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些文人群体的文学趋向都不明显，直到西汉以后才有改观。

西汉分别出现过以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汉武帝刘彻、汉宣帝刘询为中心的文人群体。他们和战国时的文人群体不一样的是不以学术为论题，而以辞赋创作为要义。梁孝王刘武时，召四方豪杰，山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羊胜、公孙诡、枚乘、庄忌、邹阳等人集于他的门下，既出谋划策，又曾共游于忘忧之馆，受命各为赋以咏物。汉武帝刘彻时，有文学侍从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流，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以赋的创作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辞赋蔚为壮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刘武、刘彻好辞赋，以辞赋为娱情怡性的工具，以获取精神上的享受，从而促进了辞赋的繁荣，辞赋最终成为象征着汉代文学的重要标志。于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种文人群体构成的现象，一是以学者或思想家为中心的文人群体，一是以帝王为中心的文人群体。前者走向学术或思想的流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延续下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则有不同的学术流派。两汉的经学派、唐代的道学派、宋明的理学派等等,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同一时期的文学。却又与文学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后者走向政治或文学,所谓走向政治,是以文人为谋臣策士所致,文人群体同时是政治的智囊团;走向文学,则是以文人为文学侍从,文学的娱情倾向得到体现。在这一点上,以汉武帝的影晌最大。以后的帝王好循汉武帝的旧例,于是有东汉灵帝鸿都门学之兴、曹操邺下文人集团之举等等。

当诗歌为人们垂青的时候,诗人群体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说起诗歌来,最早的文学时代不归属于辞赋,也不是现在常说的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首具风骚,而是诗歌雄傲一时。开始被称为《诗》或《诗三百》的《诗经》,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诗。它被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的十五国风,颂的周颂、鲁颂、商颂,其国别的地域性、音乐之别的文体性及其各自风格的特质,表面上容易给人那时或许存在着诗人群体的感觉。由于这些诗歌的作者难以确考,所以,在《诗经》里暗示所谓的诗人群体,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难以断言他们是否真正地存在。在两汉的诗歌进程中,主要的诗歌形式是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像我们所知道的,乐府本是汉代的音乐机构,负责收集民间歌谣和制作祭祀天地鬼神的乐曲。这两部分渐渐地被人们分割开来,继承了《诗经》祭祀歌曲的汉郊庙歌很少为人们谈起,大多认为民间歌谣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为人们重视,并说这些民间歌谣是汉乐

府诗。但汉乐府很难说是诗人群体的创作,《古诗十九首》则是无名氏的诗,它们因为被收在萧统所编的《文选》里而获得这样一个总名,其诗人仍无从考察,也就无法确定是一个诗人群体所作。真正诗人群体的产生并有明确记载的是在中古时期。首起的是建安三曹七子,继而本书论及的竹林七贤、二十四友、阳夏八谢、竟陵八友等诗人群体的产生,共同构成中古诗人群体的景观,成为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在隋唐以后得到发展。然而,这一时期的诗人群体并非纯粹是以“诗歌”为媒介自觉或不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它们的生成存在着较多外在于诗歌的因素,也使诗歌呈现出一致或者不一致的文化趋向。

前面提到西汉梁孝王、淮南王和汉武帝时的文人群体,同时说明这些文人群体的形成受政治强权的左右。帝王以自己手中的权力招揽天下的文人学士,天下的文人学士大多应召而至。帝王喜诗好文,令文人应诏而作也是常事。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与文学都会在一程度上迷失个性,极易成为强权的依附品。问题往往不是这样单一,不是有强权就会有与强权相应的文人群体,客观存在有强权而缺乏文学趣味的帝王并不好诗文。汉高祖有《大风歌》传世,当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况且他在马上得天下的观念没有转变,对可以安天下的儒术尚且不很重视,更不用说重视娱情怡性的文学。所以,他以排斥《诗》、《书》表现出来的排斥儒学,也排斥了包含文学在内的文化。而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在身边聚集天下的辞赋家,是因为社会政治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武帝之

时,天下财力雄厚,文治武功盛极一时,建设天下与享受天下并行,完全可以把当时流行的文学主要形式——辞赋作为欣赏的对象。他以趣味推动强权,既以趣味又以强权招揽文人学士。最有名的是用安车蒲轮召辞赋家枚乘,枚乘死于赴京途中;继而召枚乘之子枚皋为文学侍从,专事辞赋的创作。汉高祖与汉武帝对文学的不同态度和两人的爱好不一也有关系,这是为强权者自身的素养决定的。在文学史上,强权者的厌恶文学与爱好文学导致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是常有的现象,尽管文学不会全然为拥有强权者所驱使,但强权者的主动网罗与文人对强权者的依附总在发生。像建安诗人群体的形成赖曹操之力,而曹操是当时北方军事集团的领袖,戎马生涯中有登高而诵、横槊赋诗的文学浪漫,并在战争之际有心网罗文人。建安诗人群体的形成,就是他网罗的结果。这种情况后来常常发生。像西晋贾谧聚集的“二十四友”、南朝齐代萧子良聚集的“竟陵八友”、唐太宗手下聚集的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人群体都是如此。

一个时期诗人的生活环境对诗人群体的形成也有影响。这首先是地域环境的影响,像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群体中的孟浩然和王维,受襄阳鹿门、蓝田辋川山水田园的影响;边塞诗派中的高适、岑参受西域、河北边塞风情的影响,而具有不同的诗歌风格。这一点早为人注意。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对地域、民情风俗与诗歌风格之间关系的考察,以见地域对诗人及其诗歌风格影响的深刻程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俗谚,完全可以用于

一方水土养一方诗歌。大体上，人们尤为注意南北文风的异同。像唐代李延寿、近代梁启超所论，都强调地域养育人的性情，进而作用于文风。这里要注意的是，有的诗人群体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地域影响下形成的，实际上却不是。如北宋的江西诗派，它因领袖黄庭坚是江西人而得名。其形成根本上还不是江西地域的影响。而是他诗歌风格所产生的魅力所致。南宋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中就说：“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其次是职业环境的影响，如中唐李豫大历年间的两大诗人群体，即台阁诗人群体和地方官诗人群体，就和他们从事的工作有关。又如北宋初年的“西昆体”诗人群体，如果不是杨亿、刘筠、钱惟演受命入台阁编纂《历代君臣事迹》，也许不会有西昆派诗人群体的形成。环境对诗人的影响中，有一种既奇特又自然的现象，即家庭或家族内存在的诗人群。魏之三曹、宋之三苏，是家庭性质的；而从西晋到南朝齐代的谢氏诗人群体，就是家族性的。家庭或家族的亲和力，无形中导致了父子诗人、兄弟诗人和叔侄诗人等特征。中古诗人群体诗歌的诗史现象、游仙现象、玄言现象等等，都是和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关的。

诗人群体的形成，与诗人的审美趣味相投也是不可分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审美趣味也是如此。这一常见的道理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与人们性情的共通与差异，使人们的审美趣味

有一定的趋向和个性特征。就诗歌的大体而论,汉诗的素朴、晋诗的玄理、南朝诗的华丽,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而在不同的或者是相同的历史时期,诗人的创作个性固然存在,但终究不能影响同一时期相对一致的审美追求常常发生。建安三曹七子诗的悲凉慷慨、南朝齐代竟陵八友诗的声韵之美、初唐上官体的绮错婉媚、中唐大历诗人群体的“淡”、元白诗人群体的“俗”,韩孟诗人群体的“奇”;北宋初年白体诗人学白居易、晚唐体诗人学贾岛、姚合,西昆体诗人学李商隐;明代前七子的“诗必盛唐”等等,都是审美趣味所之。这样的审美趣味蕴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诗歌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具有的巨大力量,对诗人自觉的熏陶,或使诗人惟有亦步亦趋之功而乏创新之力,或使诗人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二是诗人的性情、好尚使他们附和或者背离时俗,形成自己的风格和诗歌的文化特征。诗人的审美趣味有的不一定是形于诗歌的趣味,而是生活趣味,像竹林七贤的形成,在性情相投的情况下,一度生活趣味相投。

中古诗人群体不是有机构成的组织,往往是松散性的,并非绝对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胡大雷在《中古文学集团》一书的结束语中说到文人集团的松散性时,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至隋代开科举,以定期的制度化的考试来招揽人才,使文学之士有了自由的晋升之阶。这样,科举制度便代替了朝廷出面组织文学集团,朝廷只担负发现与招揽文学之士的工作。”所谓官方或朝廷组织的文学集团通过科举之路可以实现,同科进士之类的文人互相引

重的现象也常有。但在文学史上,这些科举而仕之人,为文是求仕的阶梯,官趣与文趣不太一致,因科考而产生的所谓文人集团,因其政治色彩而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中古时期,文人受制于政治的现象屡有发生。政治作用下的文人集团,它们的群体性是存在的,政治却没有显示出巨大的粘合力量,使文人能够亲密无间,向心协同。从建安三曹七子到南朝的竟陵八友,都是如此。在一般的意义上,文人彼此之间因为思想性情、生活方式、才学风格等方面的差异,甚至相轻、相斗都是客观的。像三曹七子里的曹操杀孔融、竹林七贤里的嵇康与山涛绝交,社会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抹杀这些差异和矛盾。况且中古文人好风度,文人的师心使气突出的是各自的个性特征。这增强了文人的自主,不意自主之下更容易导致文人群体的松散。这影响到诗人群体的生命力,本来从初创到结束时间不长的诗人群体,在它还存在的时候,就让人看到了其中的裂痕。

诗人群体的形成应该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上述说到的不过是其生成的几个基本点。正是在这些基本点之上,从汉魏一直延续到清代社会,古代诗人群体不断生成。不同的历史时期,诗人群体构成状态不一,诗风有别。这里讨论的中古诗人群体,不是中古诗人群体的全部,却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观它们诗风的变化,可以基本上构成中古诗风之流的全貌。应该说明的是,这些诗人群体原本不是纯粹以诗歌为生活的,他们在时风影响下干政徇禄的人生道路,自觉或不自觉地使政治和文

学的因素搅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着眼点是政治,不热衷于社会政治者,则因政治产生逃避。如果单纯说文学,往往又有诗歌和散文的互渗,二者不同的文体形式而有相同或不同的思想表现。这里关注的是中古诗人群体及其诗风的演化。

南朝梁代刘勰说过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道理,被后人一再地用不同的语言方式表述过。清代叶燮说,世间无物无事不因理因势而变,“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① 中古不同王朝的更替所标志的世风之变,使诗歌风格的演化成为必然。这不单纯是社会文化的作用,也有诗人自我性情的重要关系,这也是前人早有论说的。明代陆时雍说:“人情好尚,世有转移”^②。他注意诗歌创作的人情一面,正好与刘勰所说相辅佐。诗风之变的发生源于社会生活和诗人情志,实为常理,还有诗人创作的构思方式、遣词运语的不同,也会导致诗风的变化。如皎然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③。诸如此类的情形时有发生。至于中古诗风在怎样演化,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诗品序》等篇什里都有论述。在他们所论中,诗风之变体现在三个方面,根本点是社会变迁诗风随之而变,相应地,诗人的变化、诗体的变化也

① 叶燮:《原诗》,《清诗话》,第5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② 陆时雍:《诗镜总论》,《历代诗话续编》,第141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皎然:《诗式》,《历代诗话》,第3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在发生。于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诗人，造就的诗风各异。在这里，“变”是永恒的原则，也是诗歌世界绚丽多彩的关键所在。他们对诗歌之“变”的洞察，是以文学的历史观作基点的，历史的过程是流动不居的，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后世的论诗者。他们对诗人、诗风的评价可以不一，对诗人、诗风之变的认同则是一致的。如明代王世懋曾说：“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语，然不能入经语。谢灵运出而《易》辞、《庄》语，无所不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为宗，又一变也。中间何、庾加工，沈、宋增丽，而变态至极。”^①在“变”的意义上，如果把中古诗风分为汉魏诗风和六朝诗风，视汉魏诗为一律，或者视六朝诗乃至齐、梁、陈诗为一律，就忽略了诗风演化的渐进特质。

诗风之“变”，使诗歌之流充满了活力，也是诗歌之花常新常艳的所在。从建安诗的实录、游仙，正始诗的咏怀、儒道释意识的强化到西晋以后诗的走向绮靡、走向玄理、走向山水、走向宫体等等，都有诗风传承、文化所化的深刻印痕。诗风并不等同于世风，但诗风体现出来的世风特征，意味着世风对诗人的感化深刻地感化了诗风，造就了诗歌的精神，无论受到后人的称道还是批评，都不影响它们的历史存在。探索中古诗风，审视它们为什么演化，演化有怎样的形态以及各自的特征，是要让这段历史氛围下的诗人和诗歌在我们面前重新鲜活起来，以见诗

① 王世懋：《艺圃擷余》，《历代诗话》，第77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引 言

歌在一个时期演化的历程和规律。我希望像自己 1997 年所写的《唐宋诗风流别史》一样,在这本小书里仍然“注意诗歌风格的演变和承续”,“注意诗风之流或诗人主要的诗歌风格”,“注意同一诗风之流下的风格同异之辨”^①意在让它成为断代性的诗歌风格流变史,以期与一般的中国文学史或诗歌史有所不同。我知道这是艰难的,但我有这样的用心,并希望用心和目的在自己的努力之下能够吻合。

① 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引言》,第 18~20 页,武汉出版社 1997 年版。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三曹七子开启的中古诗坛	(1)
一、“三曹七子”说	(1)
二、两汉诗歌开辟建安诗歌的道路	(19)
三、诗歌作为死亡写照凸现的“诗史”特质	(38)
四、诗人恋生酿造的求仙、游乐诗风	(56)
第二章 竹林七贤的跟进与变异	(74)
一、“竹林七贤”说	(74)
二、竹林七贤率意放达的名士风度	(88)
三、游仙诗的承续蕴含的深沉生命之痛	(107)
四、崇儒与崇道的诗歌品格	(117)
五、阮籍、嵇康诗歌风格的双重走向	(128)
第三章 二十四友及其诗歌的因袭	(140)
一、“二十四友”说	(140)
二、从竹林七贤到二十四友的世风变化	(155)